

# 论“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

纪玉山 刘洋

(吉林大学)

**【内容提要】** 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成功经验的总结，是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耗竭与环境破坏等严重的社会生态问题。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所引发的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要求“中国模式”必须完成绿色转型。“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是保持“中国模式”本身的生命力并推动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发展绿色经济、构建绿色政治、打造绿色社会是推动“中国模式”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中国模式 绿色转型 环境保护 生态治理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改革过程中累积的体制、利益、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矛盾和约束日益凸显，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明显，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枯竭与环境的破坏。经济增长中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意味着“中国模式”必须面对并承担绿色转型的迫切任务。绿色转型是对“中国模式”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和自我完善，而“中国模式”的绿色

转型同时也是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关键议题。

## 一、“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面临新的挑战

2004年5月11日，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舒亚·库伯·雷默发表了《北京共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归为三方面政策安排的结果，即坚决进行革新和实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土完整，以及循序渐进、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指出，主流经济学家基本达成共识——“中国模式”是一种发展模式，中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范式（马丁·哈特兰兹伯格、保罗·伯克特,2005）。从本质看，“北京共识”是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总体客观评价和改革思想的归纳；“中国模式”是对我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在对未来国内外经济与政治环境预测基础上，归纳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成功引领中国改革发展前行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它不仅是对改革成果的总结，也是未来改革之路的灯塔。但是，当前的中国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经济体改革过程中累积起来的体制转型障碍、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日趋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各种矛盾正逐渐激化，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 二、“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与“中国模式”转型

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于 1989 年发表了《华盛顿共识》一文，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和随后的前苏东地区国家的经济转轨提出了一系列以“自由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为核心的政策主张。尽管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使“华盛顿共识”成为当时西方世界主流的发展理念和经济政策框架。然而，也正是受“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体制转型中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使得“华盛顿共识”遭到空前的指责和批判(科勒德克,2000)。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后华盛顿共识”更多地关注与转型和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进步；不仅应关注增长，还要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问题。“后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可持续、公平与民主的发展理念(斯蒂格利茨,1999a)。首先，追求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其次，追求平等的发展主张社会各阶层均能平等地分享发展带来的红利；最后，追求民主的发展意味着社会民众能够以各种方式广泛地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决策。在此基础上，“后华盛顿共识”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的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必须承认政府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斯蒂格利茨,1999b)。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

分配。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福利社会型资本主义与“欧洲价值观”彰显了欧洲社会发展的独立性，但是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经济仍主导着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目前相对弱勢的“欧洲价值观”在政策导向与发展模式上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乏力的。尽管民主作为“欧洲价值观”的一个基本理念长期以来得到欧洲国家的普遍珍视，然而，有研究显示，欧洲社会的现代程序性民主实际上带来了民众个体幸福感的流逝(李辉,2013)。进一步地，如今的欧债危机加剧了欧盟内部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矛盾与分化，等级化倾向与自私的利益需求，将随着债务危机的加深直接冲击着欧盟成立的根基——成员国间的平等与团结精神。实际上，这正是欧盟与“欧洲价值观”目前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乔治·索罗斯,2012)。

“中国模式”虽然突破了“华盛顿共识”的框架局限，引导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资源日趋枯竭、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等一系列问题。而在面对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冲突时，“后华盛顿共识”和“欧洲价值观”所包含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确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吴敬琏(2013)认为，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出口导向政策的短期积极效应正逐渐减弱，从长期来看，中国亟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应对传统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技术创新滞

后及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等问题。毋庸置疑，政府主导下的海量资源投入与强大社会动员是“中国模式”引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保证，然而，在强政府、大国企与海量投资营造的高速增长绩效的背后却是中国经济高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投资饥渴症”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如今，为高速增长付出的巨额成本和消极后果正在显现，并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未来转型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萧功秦(2010)指出,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关系与体制环境下，“中国模式”面临着腐败、国富民贫、国企病、两极分化与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五大困境”。斯蒂格利茨(2014)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角色关系出发,指出当前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是由于“市场太多”而“政府太少”，政府因定位错误，“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而应该做的事却没做”。对此，他强调中国应在环境污染治理、医疗体制改革、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服务、产业结构转型、加强市场监管与推进财税改革方面强化政府作用。此外，常修泽（2008）和邱耕田（2008）等人认为在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方面，“中国模式”的低技术水平、粗放式的发展使得资源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单位 GDP 能源消耗巨大的粗放型经济难以为继。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和能源结构已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这使得中国在后危机与低碳经济时代承担着减排与发展的双重压力。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节能环保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寻找新的解决方案，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也已势在必行。

### 三、“中国模式”绿色转型的内涵

“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是自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对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的一次集中回应，同时也是在全球气候环境日趋恶化、资源能源形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为在低碳经济时代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次积极调整。与一般意义上的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所不同的是，“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基于更为宏观的战略视阈，是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模式的深度转变，并以“绿色”概念为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着力点，从而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理念。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是对“中国模式”的一次补充和完善。这意味着，尽管中国在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中已经积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但是，如果高速的经济增长仍停留在依靠强势政府推动下的海量投资和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依赖上，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将难以为继。

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模式”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意味着中国将从传统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黑色发展”，向具有集约型、高科技、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特征的“绿色发展”转变。在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应致力于建立一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方式，并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充分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依靠科技进步全面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面对传统发展方式重“速度”轻“效益”，重“总量”轻“质量”，重短期经济效益，轻长期社会效益的局限，“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应更多地将节约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具体的理论与实践

过程中，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是关系到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能否促进经济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和谐统一的一个关键议题。

毫无疑问，转型是对传统模式的扬弃，是在对中国三十余年经济高速增长与问题不断积累过程的反思中寻找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出路。绿色转型是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新时期对“中国模式”的一次深度调整，它要求中国必须认识到依靠过度资源消耗和严重污染环境的这种寅吃卯粮的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从而必须在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上推动“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借助这次转型，中国将推动当前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产业与能源结构的全面转变与升级。在此基础上，依靠区域和部门内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落实节能减排等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推动绿色转型从国家发展理念的宏观层面向诸如建筑、交通、财政和金融等具体领域的深入拓展。

因此，“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既是一场“转型+发展”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同时也是面向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一场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作为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知的深化。它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向现代的集约型转变，更多地蕴含着从以“GDP主义”为核心

的单一性增长理念向更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包容性增长理念的一种传承与超越(纪玉山,2012)。

在全球资源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大环境下,转型业已成为各个国家寻找新经济增长点,并谋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向以工业资本为基础的实体经济转型,以及传统的高碳经济向未来的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在面临各种问题与挑战下就未来改革、转型与发展的两条主线。与此同时,在全球两大转型潮流的带动下,一方面,发达国家为抑制金融泡沫与促进经济复苏出现了“再工业化”与“再制造业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全球经济的回归实体化同时又进一步要求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型,而依靠科技进步带动高附加值产业和绿色低碳产业的加速发展将成为后工业化时代推动经济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中大国,在迎合全球经济转型的潮流中积极推动“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既是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同时,这种转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升级进程缓慢、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又是一次巨大的挑战。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逐渐步入经济增速相对放缓的结构调整期,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与体制改革进程相对滞后的矛盾致使中国在改革与发展中所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随着市场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正面临着“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后发劣势”等问题的挑战。在传统的人口和改革红利逐渐稀释的背景下,

中国只有适时进行调整，积极推动“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才能在转型与发展的同时逐步解决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问题，并进一步突破在深化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瓶颈。有学者曾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十二五”规划以来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变视为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三次大转型(李佐军 等,2012)。显然，“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将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同时也是保持“中国模式”在全球转型浪潮中彰显生命力的重要途径。面对“中国模式”在推动三十余年改革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实则是推动“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 四、“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路径

随着国家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以及“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概念的提出，近年来，学界对推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政策建议的探讨层出不穷。为突出问题讨论的针对性，我们将基于“中国模式”问题研究主要涵盖的三大领域：经济、政治和社会，来对应地为“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提出“绿色经济”、“绿色政治”与“绿色社会”建构的基本途径。

##### （一）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环境经

济学研究中(皮尔斯,1996),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发展目标,以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和持续服务业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发展绿色经济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延续几个世纪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否定,同时也是中国摆脱现有的资源过度消耗与环境严重污染的非持续性的“黑色经济”,实现“中国模式”经济转型的唯一出路。对此,中国应当以生态化、知识化与可持续化为目标,建立并完善生态化的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推动科技生态化、生产力生态化,以及国民经济体系的生态化,努力打造绿色经济强国。首先,要形成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培育绿色新兴产业,推动绿色产业集聚,提高产品的生态价值。与此同时,要完善资源环境价格的形成机制,改变绿色生产的成本收益结构,并在财税和投融资政策上向绿色产业倾斜,积极引导和培育绿色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其次,加强绿色经济的科技研发,培养绿色产业科技创新人才,建立支持绿色产业的产学研体系平台和人力资本的培养激励机制。加强政府、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间在绿色科技研发上的分工协作,整合各部门各机构的优势资源,构建绿色产业技术自主创新体系。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要围绕“绿色企业家”和绿色经济技术尖端人才建设绿色科技创新队伍,为绿色经济的发展凝聚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复次,要完善绿色经济发展中金融领域的投融资渠道,发展绿色金融、利用绿色信贷政策引导优质资金流向绿色产业。在利用融资工具的同时,还要鼓励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对绿色产业进行重点扶持,依靠倾斜性的财税金融政策,实现对高污染、高耗能 and 产能过剩行业的约束、惩罚和

淘汰。再次，通过政府采购和绿色产品补贴的政策示范效应，刺激绿色消费，推动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的良性互动。政府要利用合理的经济手段和舆论宣传，鼓励社会民众的绿色消费行为并树立绿色消费理念，通过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社区和绿色家庭的建设，为绿色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最后，要努力构建绿色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加快完善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体系，把环境绩效纳入到地方政绩考核的评估体系中，真正将资源环境作为地方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彻底转变只着眼于地方经济总量的 GDP 政绩观。此外，要加快与绿色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提高环境司法的质量，强化环境执法的力度，积极构建并完善绿色经济的法律体系，以法治建设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支撑。

## （二）绿色政治

上世纪 60-70 年代普遍兴起于西方世界的生态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以及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下经济社会结构的后工业化转型中，政治观念与价值取向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作为对物质主义支配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引致的全球生态环境系统严重破坏的回应，绿色政治的兴起是一场新生社会力量和政治要求对传统政治议题和政治制度的革命(刘东国,2002)。如今，资源环境问题也已渗透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当局和民众已经深刻认识到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能以资源耗竭与环境破坏为代价，特别是与绿色政治的价值理念相比，中国传统的政治议题和政治体制中缺乏对生态民主的基本关注。应当看到的是，作

为推动“中国模式”在政治领域实现绿色转型的一条可行性路径，绿色政治所倡导的生态智慧、社会正义、基层民主、非暴力、永续发展和尊重多样性(科尔曼,2002)，与西方传统意义上激进的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比更为温和，在应对资源保护与环境治理的全球性问题上更富有政治包容性。因此，绿色政治与“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内涵共性，这为依靠构建绿色政治来逐步推动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某种启发和借鉴意义。

构建绿色政治并不是对“中国模式”的政治体制予以全面变革，而是突破政治运行过程中传统思维理念的局限性，为政府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为社会民众找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依存的生活方式(王彩波、屈冬梅,2008)。对此，首先应当树立以协调、综合、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政治价值观，把绿色政治理念融入到政治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其次，推行广泛的基层民主并扩大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与生态化。引导并鼓励民众广泛地参与政府公共事务，特别是环境治理领域的决策、管理和监督，这将为未来全民参与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最后，应致力于把绿色政治观同中国现有国情和政策相结合，在资源环境保护被确立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基础上，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恰恰反映了中央政府具有绿色政治价值观的施政理念。中国在未来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将绿色价值观同现有政策和具体国情更好地融合，从而推动“新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向生态民主政治的转型进程。

### （三）绿色社会

基于全球范围内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形势，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派理论家们提出应致力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建设来解决全球资源环境问题，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有学者曾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将成为 21 世纪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思潮(俞可平,1998)。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对实现绿色社会的变革具有积极意义，但在促进绿色社会变革的力量和途径上所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致使其同样陷入了诸如科尔曼的“自然的浪漫主义”窠臼(黄晓云,2010; 董 德、孙 越,2012)。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关注资源保护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理念，生态社会主义对如今饱受资源环境问题困扰的中国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习惯于沉浸在“中国模式”下高速增长所创造的物质繁荣，而忽视了增长与繁荣背后的资源耗竭与环境污染。而在“强政府——弱社会”的体制环境下，中国的社会网络实际上依附于行政网络(胡 键,2010)，这意味着带有利益多元化特征的公民社会在强大的行政权力等级化的国家体制中仍然十分脆弱。于是，在“供给型”主导的社会模式中，政府更多地承担着生态环境治理的宣传组织工作，社会力量的相对弱势使得企业、社区和个体无法自觉有效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的社会活动中。因此，“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应在构建绿色社会的过程中致力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生态环境的公共治理中发挥社会的作用。这意味着绿色社会的构建不仅应当将减少污染物排放、解决贫困问题、缩减贫富差

距与机会不平等、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及扩大民主参与作为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坎德亚斯,2013)，还应引入并制定参与性计划以在环境保护和其它领域的公共治理中改变传统的决策机制。毫无疑问，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与国家主义的政府干预都无法独立地应对资源保护与环境治理问题，而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公共池塘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围绕整个资源系统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成功案例(奥斯特罗姆,2000)，无疑为推动未来中国城市社区及广大农村地区资源环境的公共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这当然需要政府引导并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使社区成员成为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利益相关者，更重要地在于培养社会民众的“绿色公民”意识，以及通过分权化与民主参与等机制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自治水平。必须补充的是，作为基本经济组织的企业在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的问题上同样责无旁贷。通过构建企业绿色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企业在追逐利润最大化过程中资源浪费与破坏环境的短期行为(吴国刚,2005)，将资源环境成本纳入到企业的财务会计成本核算，并对企业的社会生态效益给予更高的正反馈。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将是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契机，而这将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进步而言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 结论和评述

毫无疑问，“中国模式”下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使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中国模式”“光环”的背后，同样存在着制约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各种问题。显

然，“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既是对“中国模式”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一场深入反思，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这意味着，“中国模式”并不是静态僵化的，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推动着“中国模式”的不断发展与自我完善。显然，“中国模式”更多地是基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其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及存在的具体问题决定了“中国模式”尚不足以作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而向全球范围内的不发达国家进行输出和推广(纪玉山,2014)。与“华盛顿共识”所不同的是，“中国模式”更多地从本国国情的特殊性出发，并在与世界范围内其它“模式”的交流中尊重不同价值理念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着眼于解决目前中国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而这次转型同样将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积极构建绿色经济、绿色政治与绿色社会是推动“中国模式”转型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促进未来中国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的一次积极实践。值得补充的是，作为具体制度的内化，“绿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中国模式”在绿色转型中的制度建构。这意味着只有在绿色经济、绿色政治和绿色社会不断发育和成熟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范围内对绿色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共同认知与信仰。尽管任重道远，然而只有积极推动“中国模式”的绿色转型，才能在根本上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在对改革与发展的不断反思和经验总结中，提升“中国模式”在国际社

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参考文献

[1]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2000,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余迅达、陈旭东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 常修泽, 2008, 中国发展模式论纲, 《生产力研究》, 第1期。

[3] 董德、孙越, 2012, “护生”价值观与“生态文明”的构建——科尔曼《生态社会: 建设一个绿色社会》解读, 《江苏社会科学》, 第5期。

[4] (美)马丁·哈特兰兹伯格、保罗·伯克特, 2005, 解读中国模式,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第2期。

[5] 胡键, 2010, 争论中的“中国模式”: 内涵、特点和意义, 《社会科学》, 第6期。

[6] 黄晓云, 2010, 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色社会变革观点评析, 《湖北社会科学》, 第8期。

[7] 纪玉山, 2012, 从“单一”到“包容”: 中国经济增长理念的传承与超越, 《学习与探索》, 第3期。

[8] 纪玉山、刘洋, 2014,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 探索、争鸣与重识, 《学术交流》, 第2期。

[9] (德)马里奥·坎德亚斯, 2013, 什么是“社会党人”的“绿色社会主义”, 巩至华译,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第2期。

[10] (美)丹尼尔·科尔曼, 2006, 《生态政治: 建设一个绿色社会》, 梅俊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1] (波)科勒德克, 2000, 《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刘晓勇等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2] 李辉, 2013, 宏观政治环境与国民幸福感——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 复旦政治学评论, 第13辑。

[13] 李佐军等, 2012, 《中国绿色转型发展报告》,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4] 刘东国, 2002, 《绿党政治》, 上海: 上海科学院出版社。

[15] (英)大卫·皮尔斯, 1996, 《绿色经济的蓝图》, 何晓军译, 北京: 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6] 邱耕田, 2008, 中国模式与低代价发展道路,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第 3 期。

[17] (美) 斯蒂格利茨, 1999a, 后华盛顿共识(上), 段丽萍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第 1 期。

[18] (美) 斯蒂格利茨, 1999b, 后华盛顿共识(下), 段丽萍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第 2 期。

[19] (美) 斯蒂格利茨, 2014, 中国问题在市场太多政府太少, 《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40403/172818705109.shtml>。

[20] 乔治·索罗斯, 2012, 欧洲的价值观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 12 月 28 日。

[21] 王彩波、屈冬梅, 2008, 绿色政治: 将自然关怀与环境思维引入政治维度,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第 3 期。

[22] 吴国刚, 2005, 公司的绿色社会责任,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 期。

[23] 吴敬琏, 2013, 强势政府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 《凤凰网财经》,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812/10411745\\_0.shtml](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812/10411745_0.shtml)。

[24] 萧功秦, 2010, 中国模式面临五大困境, 《人民论坛》, 第 31 期。

[25] 俞可平, 1998,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联系方式:

纪玉山, 电话: 18166880349 ; 电子邮箱: [jiyushan@vip.sina.com](mailto:jiyushan@vip.sina.com)

通讯地址: 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